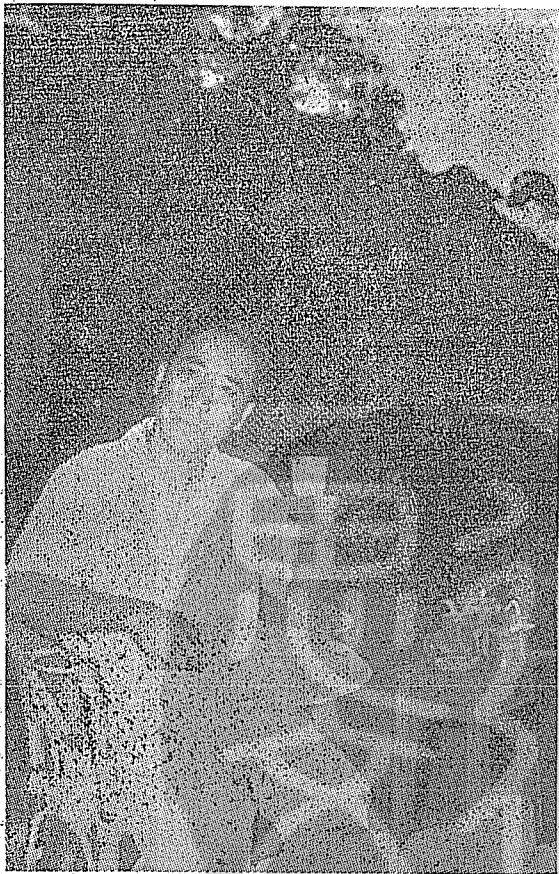


戴笠先生廿四年祭

喬家才



戴雨農（笠）先生抗戰期中攝於重慶南岸之黃山。

無名英雄最高榮譽

戴雨農先生罹難，轉瞬二十四年。當我們艱苦抗戰八年，日本軍閥無條件投降以後，爲了維護民族正氣，國家綱紀，對六億同胞和萬世子孫有所交代，決定逮捕民族敗類，爲虎作倀的重要漢奸，交付國法審判。然而漢奸逃匿全國各地，要想一個也不漏網，談何容易。所以，肅奸工作非常繁重，這種繁重的工作，很自然的落在戴先生的肩膀上。他爲了指揮各地的同志做好肅奸工作，不得不席不暇暖，奔波於全國各大城市。民國三十五年三月十三日上午他離開北平，飛往天津。天津住了兩天，又飛往青島。三月十七日由青島起飛，因爲京滬一帶天氣惡劣，決定在南京或上海降落。不幸飛機在南京雨花臺以南的岱山撞毀，因而殉職，同機遇難的一共七個人。

我同戴雨農先生是黃埔第六期同期同學，他比我大十歲。民國十六年清黨以後，我當選爲黃埔特別黨部的執行委員，他是騎兵營黨部的執行委員，爲了黨務工作，經常接觸。九一八以後，政府爲對付日本軍閥侵略，成立情報機構，由他負責。我自從二十一年參加了他領導的工作，一直到他殉職，十三年間，他對我愛護備至，始終像一位老大哥對待一個小弟弟。即頂小的事情，像應該理髮了，在有外國人參加的宴會上，吃蘋果應當怎樣削皮，他都告訴我。我的脾氣不好，他能容忍我。他很忙，人情味又很濃，我每次到南京或重慶，總要請我吃一次飯，親親切切談一兩個鐘頭。他交給我的任務，不論怎樣完成，都表示滿意，從來沒有挑剔過，責備過我一句話。一個人總有一死，有些人死後很快就被遺忘了，惟有戴雨農先生死後二十多年，每一個同志迄今都在懷念他。有一位朋友對我說：「五嶽歸來不看山，跟戴先生做過事，就不願再做別

的事情了，因為再找不到像他那樣精明，胸襟偉大，待人誠懇的長官。」戰時和他合作過四年的美國海軍梅樂斯中將，在他殉職以後好多年，一提到他，總是傷心落淚，他感人之深，可見一斑。

深厚的中國文化，在不知不覺中，會孕育出至大至剛的民族英雄，歷史上這種人物不勝枚舉。戴先生承受中國文化的薰陶，非常深刻。他對我們民族道德「忠、誠」二字，身體力行，發揚到極點。他對領袖、對國家的忠貞，完全出於肺腑，他那種盡忠報國，忠於職責的精神，沒有人能及得上。他對朋友、對同志處處流露出一種至誠的熱情，所以能使每一個人獻出他們的赤心和熱血爲他工作。他對「春秋大義，大夫無私交」的古訓，遵守不渝，非奉領袖的命令，絕不私自同任何一個外國人或工作以外的人接觸。許多外國人不懂得中國道德，再加上敵人漢奸和共產黨的惡意中傷，於是，他們道聽途說，把這些惡毒的誹謗當做珍貴資料，報告到他們的政府，梅樂斯在他們國務院和陸海軍情報署看到有關戴先生的資料：「戴笠是一個出名的刺客，又說他是一個與蓋世太保類似的神秘組織的頭目，……他非常不喜歡外國人，因此，絕少有外國人能夠見到他的面。」滿紙荒唐，可笑之至。

「無名英雄」是戴雨農先生頒贈給每一個同志的最高榮譽，他的同志沒有一個人計較官職高低的。他自己對國家的功勳非常大，可是在他生前，很少有人知道他做了些甚麼。因爲在報紙上看不到他的名字，也看不到記載有關他個人功績

的任何新聞。他負擔了非常重大的責任，却是沒沒無聞。確實做到了不求名，不求利。民國三十四年，國民黨在重慶召開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他當選爲中央執行委員，但是他立即把這一項最高榮譽讓給了九一八曾在東北抵抗日本軍閥的馬占山將軍。當他殉職的時候，他的官階祇是個陸軍少將，死後才追贈爲中將。當年他領導的同志擔任少將職務的就有好幾十人，有的官階比他還高，例如忠義救國軍總指揮俞作柏將軍民國二十七年的官階就是陸軍中將。

現在我要敘述戴雨農先生一生中幾件比較重要的故事，以紀念他殉職二十四週年。

以頭相贈化敵為友

民國十七年國民革命軍完成北伐，統一中國。有些假革命的野心軍人並不希望國家真正統一，國民革命真的成功，他們不願意放下武器，共同爲國家建設而努力。十八年馮玉祥在河南叛變，他的叛變是有來歷的，不足爲奇。十三年第二次直奉戰爭，馮玉祥倒了吳佩孚的戈，同奉系張作霖合作起來，擁護段祺瑞爲執政。十四年馮張分裂，馮玉祥被張作霖趕出北平，十五年軍事失敗，逃往莫斯科，同蘇俄和共產黨正式有了勾結。

據沈維翰大律師說，民國十六年四月六日北京京師警察廳搜查蘇俄使館，捉走共產黨的頭目李大劍，並且搜到一大批有關中國的文件，印成一本「蘇聯陰謀文證」，裏面有許多馮玉祥同蘇俄使館來往的文件，他們計劃等北伐軍打到黃河流域，就來個先下手爲強，共產黨同馮玉祥裏應外

合，先拿下北平，由馮來統制北方，阻止國民黨統一全國。我雖沒有看過「蘇聯陰謀文證」，但是沈大律師是當年經辦這個案子的人，他的敘述應該是正確的。

馮玉祥叛變，沒有多久，被閻百川先生邀請到山西，把他囚禁在晉祠，叛變就算結束了。唐生智原是討馮前敵指揮，眼看馮玉祥失敗，有些兔死狐悲，於是搖身一變，於十二月間，捏造了許多人的名字，發表通電，他也來一次叛變。這一年冬天，河南下了一場大雪，使唐生智動彈不得，真是多行不義必自斃，野心軍閥必然遭受天譴。戴先生在潼關附近聽到唐生智叛變的消息，立刻到了鄭州，沿平漢路南下，一方面偵察唐部活動的情形，一方面進行瓦解唐部的工作。大概是由於他工作過於積極，不久，就被唐生智知道了。他聽到戴笠兩個字的確有些頭痛，況且又在進行瓦解他的部隊，更非常害怕，於是懸賞現洋十萬元，購買戴笠的人頭。那時唐的特務營長兼軍督察處處長周偉龍駐防在信陽，負責主持捉拿戴先生。周偉龍和唐生智雖然是湖南同鄉，但是周係黃埔第四期同學，抱負不凡。戴先生衡量當時的情況，他很難逃出唐生智撒下的天羅地網，於是他決定親自去找周偉龍。

「我就是戴笠！」戴先生走進周偉龍的特務營部，拍拍自己的腦袋，自我介紹：「聽說唐孟瀟出十萬元現大洋購買我的腦袋，你是黃埔同學，這顆腦袋特意來送給自己的同學，你不但可以得到十萬現大洋的賞格，說不定，唐孟瀟還會升你的官呢！」他這一着，可真把周偉龍唬住了

，半天說不出話來，不知該怎麼處置；周偉龍做夢也沒有想到戴笠是這樣一個人。戴先生接着以革命大道理來責備周偉龍，不應當以一個堂堂正正的黃埔學生跟着一個反覆無常，一再背叛革命的無知悍將，也來背叛國家，背叛革命領袖。他分析當前的形勢，唐生智和中央的力量對比，料定唐生智必然失敗，跟着唐生智走，毫無前途，他問周偉龍：「一旦唐孟濂失敗，你打算怎樣？」

戴雨農先生這種大無畏的革命精神，誠懇的忠貞態度，使周偉龍深受感動，佩服得五體投地。周偉龍沒有爲了十萬元把戴笠的人頭賣給唐生智，他立刻找來一套士兵的服裝，讓戴先生穿上，裝扮成他的衛士，跟着他走出營部，聲言要去捉拿戴笠，他們兩個人乘車離開唐生智的範圍，一同逃去，周偉龍選擇了他應走的路，變成戴先生的幹部。

假使，戴先生沒有感人的至誠，沒有視死如歸的勇氣，沒有發自內心對國家和領袖的忠貞，周偉龍就會澈底覺悟嗎？會棄暗投明，親自護送他逃出唐生智的天羅地網，一同逃走嗎？戴雨農先生一生處事，諸如此類的情況太多了。他領導的十萬同志，同敵人作殊死戰，前仆後繼，個個冒險犯難，多半是受了他的精神感召。

西安事變昂然入虎穴

西安事變至少種下兩個惡因，結成一個惡果。第一，這一次事變，全國男女老幼對於革命領袖安全所表現的熱情和關切，十分感人，也十分

驚人。日本軍閥看見這種情形，非常害怕，他們怕中國有了這樣一位全國擁戴的領袖，很快就會強壯起來，因而提前了侵略的時間表。第二，共產黨因事變得到喘息的機會，免遭澈底崩潰，而能借抗戰日益壯大，終於竊據大陸，使六億同胞失去自由，陷於恐怖饑餓的水深火熱之中。所以，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十二日張學良和楊虎城在西安劫持領袖，發動西安事變，實在是導致今日大陸沉淪的主要原因。

民國二十五年我正在北平工作，當時北平的憲兵還是張學良從關外帶到北平的東北憲兵，憲兵司令也是東北軍的重要將領邵文凱。我們在這一年的夏天，不斷從東北憲兵方面得到許多西安不穩的消息。張學良的部隊已被共產黨滲透，他本人的言論舉動也失常態，情況一天比一天壞。領袖以爲他對張學良仁至義盡，張不會做出叛逆的事情來，想不到他居然同楊虎城發動了事變，闖下滔天大禍。當時西安的情況，周恩來以下的共產黨分子非常活動，潛伏在張楊兩部的激烈分子非常衝動，連張學良也控制不了。西安變成了一座瘋狂的危城，住在西京招待所的中央文武大員都失去自由，被他們很不友善的就地囚禁起來，想逃都逃不出來，邵元冲先生就因爲想逃走，被他們一槍打死。

共產黨分子和叛軍裏面的激烈分子仇視中央官員，更痛恨戴雨農先生，他們認爲他是他們的剋星，死對頭，如果當時他也在西安，他們會立刻活剝了他的皮，可是他卻決定陪同蔣夫人一同由南京飛往西安。他覺得領袖既然蒙難，他就

應該去赴難。當年國父蒙難永豐兵艦，領袖也在上海得到消息，立刻前往赴難；現在領袖也蒙了難，難道就沒有有一個幹部效法他當年赴難的精神，也去赴難嗎？至少他個人也要這樣做。其實，戴先生決定赴西安，並不是爲了赴難而赴難，他希望因他自己進入危城，而使問題容易解決，因爲張學良很可能信賴他，他要盡力去說服張學良，幫助他解決困難。萬一他的努力失敗了，不幸殉難，爲領袖而死，死也死得光榮。許多朋友認爲旁人或者可以去西安，惟獨他去不得，他去西安，如羊入虎羣，凶多吉少，萬分危險，都極力勸阻他。結果，一切勸阻無效，動搖不了他效忠領袖，不顧死生的決心，終於去了西安。

蔣夫人的座機降落到西安的飛機場，張學良看見戴先生最後從飛機上走下來，真是又驚又怕。驚的是戴雨農渾身是膽，居然敢來連他自己也感覺頭痛的西安。怕的是西安的激烈分子殺害了他，會增加解決事變的困難，而且將來他必須要擔負殺人的責任。張學良不能讓他自由活動，或者安置在自己無法控制的地方。想一想，祇有自己家裏最安全，一點空隙都不敢漏，立刻護送他自己到公館的地下室，不准任何人接近，表面上看來像是囚禁，實際上是在負責保護他。

張學良忙於接待蔣夫人和宋子文先生，又忙於商討事變的善後問題，沒有立刻去看戴先生，又不讓他去見領袖，胡裏胡塗把他放在張學良的地下室，咫尺天涯，竟不能隨侍。領袖左右，連見一次面都不可能，心裏萬分着急，越想越氣憤，越想越不甘心。於是寫下一紙絕命書：「自